

经济学家随笔书系

经济学与常识

张宇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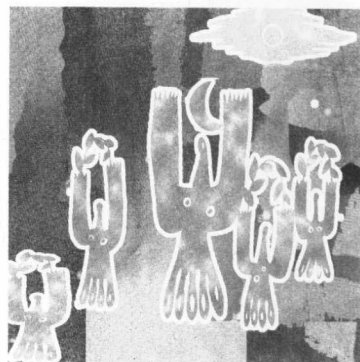
人们熟知的常识中蕴含着貌似深奥
难测的经济学理论。换言之，从我们耳濡
目染的现象中不难找到理解经济学本质的钥匙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经济学家随笔书系

经济学与常识



张
宇
燕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与常识/张宇燕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1

(经济学家随笔书系)

ISBN 7-211-04913-8

I. 经... II. 张...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151 号

经济学与常识

JINGJIXUE YU CHANGSHI

作 者: 张宇燕

责任编辑: 陈艺静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屏山印刷厂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11-04913-8/F·317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宇燕 1960年9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版了《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1年），《说服自我》（1997年），《共享繁荣》（1998年），《旧邦新命》（2004年），《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即出），《樱桃园里的梯子》（即出）；与他人共同主编《西方经济学》（1997年），《从计划到市场》（1999年）等，主持翻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2003年），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改革》、《国际经济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关心的问题是运用政治经济学于历史研究之中。

封面图画：卢 青
装帧设计：陈好琳 黄 勤
责任编辑：陈艺静

E-mail: chenyingjing@vip.sina.com
TEL: 0591-87557806-1023

自序

好像是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再版前言中，熊彼特写道：和孩子一样，书一旦出版便有了自己的命运。也许是因为受熊彼特的影响太深，《经济学与常识》的旧版面世后，作为作者，我除了在题名送友时碰碰它外，从未再翻阅过它。当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陈艺静编辑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出版社有意重新出版此书之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浏览一下它的冲动。谁知这一浏览，竟着实让我不时脸红汗冒。在自责的同时，深感愧对读者，因为旧版可以说是错误百出，有些地方甚至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作为作者，我简直是无地自容。如果当初我在把磁盘交给出版社之前再认真校对一遍，如果当初在书付印之前我坚持再审阅一遍，那该有多好呀！在后悔不迭之时，除了仔细校对之外，如今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向旧版读者致歉了。

文字及语句上的印刷错误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还在于对思想的表述。书中论及的许多想法，今天看来可以表述得更清晰。书中谈到的许多问题，今天看来可以解释得更透彻。书中发表的许多议论，今天看来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举例说，布坎南的立宪层次的集体决策与执行层次的集体决策的基本区别，在于作为规则的规则，前者要求的是一致同意。而作为受宪法制约或引导的规则，后者不必一致同意，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一致同意。在宪法层次上，人们一致同意授予法院独立审判与裁决的权力之后，尽管法官的判决极可能使至少当事的一方“不同意”，但这并不违背一致同意原则，因为宪法事先已经被一致同意了。强制或违背人们意愿的裁决与一致同意原则并行不悖，道理便在于此。由此引出的一个曾经长期使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非一致同意与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关系。众所周知，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不存在至少

使一人获益同时又不损害任何人之利益的机会。显而易见，正如布坎南反复强调的，一致同意与帕累托最优本质上毫无二致。现在的问题在于，科斯第二定理所导致的资源有效配置，尽管不失为帕累托改进，但至少按字面的含义，与帕累托最优无关，因为依此做出的判决，很可能使承担责任者“不同意”。这里，一旦理解了布坎南区分出来的执行层次上的集体决策，我们的困惑便荡然无存了：法官并非使所有当事人皆大欢喜的判决是在执行层次上做出的，而执行层次上的集体决策是由以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宪法规则加以保证和约定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原本打算利用此次新版的机会，对那些表述不够清晰、简练，甚至欠准确的文字加以澄清和规范，但这样做我多少还是有些顾虑。毕竟那些文章如实地反映了 10 多年前的思考或认识水平，把它们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也还可以给读者一个了解作者思想发展及认识演进之轨迹的机会。当然，熊彼特的那个观念从某种程度上也打动了我。文字一旦被印刷刊行，作者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好任它去了。作者能够做的“补救”，恐怕也只能是再撰写新文了。应该讲，对本书原来收录的文章，我的喜好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文章再次刊印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个别的文字和整个文集的风格也不十分吻合，同时，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我又陆续撰写了一些思想脉络和表达方式与此书相近的书评随笔，按照陈艺静编辑一再鼓励我的话说，将其收录于新版书之中，也有利于读者对作者的跟踪了解。有鉴于此，我最终还是打消掉了原先修改文章的想法，而代之以删减 4 篇旧文和添加 7 篇“新作”。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毫无疑问，书中欠妥当、不成熟，甚至误读的地方仍有不少。文责自然全部由我来负。

2004 年 6 月

目 录

狐兔博弈的经济学启示/1

经济学与常识/10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谈起

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科学方法论/17

表述方式、经济效应及其他/23

制度选择、历史哲学与苏联经济史/30

经济学与道德行为/38

——为什么盗窃行为不道德及其他

经济学中的时间/48

“假如没有……” /58

——谈谈 199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

“三生万物” /66

——经济学与数字“3”

不确定性：人类的朋友/74

消费与储蓄/81

腐败的政治经济学/91

经济学·生理学·病理学/100

——关于经济学或经济学家之社会功能的对话

对公有制及其有关问题的一些思考/108

罗斯福·凯恩斯·希特勒/123

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130

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143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152

——写在伊拉克开战之际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159

经济体制的“主义分类”与整体演进/172

科斯定理·产权·经济制度/180

——读张五常著作随想

凡勃伦和他的《有闲阶级论》/192

战争的启示/205

——读《昨与今——战后世界的变迁》随想

企业家的性质/214

经济体制的太极图/221

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227

——谈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触摸经济学的灵魂/235

“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的错误史”/244

有关公共选择理论的几点想法/252

由制度安排决定的经济发展/256

解读“行政性一致同意”/263

——评唐寿宁先生对中国公共职能机构改革的解释

附录 原序/269

狐兔博弈的经济学启示

我记不起是在哪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经济学与其说是“学”出来的，不如说是“悟”出来的。我不敢夸口说自己属于悟出经济学真谛的那一群人，但我想“悟”这一精神体验活动本身恐怕还有个层次问题，或是三六九等。既然“悟”本身有深有浅，那么谈出来也就不怕贻笑大方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对各种社会现象给出自己的解释，或是相反，从各类现象中得到对经济学的检验，即所谓于微见著。这里之所以给“科学”两字打上引号，其原因在于此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像个马蜂窝，在于“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此我们就姑且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解释吧。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曾经写过一本题为《经济控制论导论》的书。在其中他特别讨论了“追捕问题和最优控制”。兰格所讲的故事中的主角是狗和兔子。考虑到狗在人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我在此用狐狸替代之，并且相信这种做法同样能够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兰格叙述道，有一只狐狸发现了远处有一只兔子并追捕它。兔子这时沿横坐标自左向右轴逃窜，而狐狸则沿纵坐标轴从上向下追赶。考虑到兔子朝横向奔跑，故为了捉到它，狐狸自然会不断调整追捕线路而向右下方追赶，最后在横轴上的某一点上捕到兔子。这样一来，狐狸的追捕路线便是一条弧线而非直线。就此兰格指出，所谓最优控制就是让狐狸跑直线（短于弧线），即打个提前量，从而最经济地捕捉到兔子。无疑，这个故事在阐述最优控

制论时十分成功，但遗憾的是，事实恐怕远非如此，因为兔子绝非仅是一味地逃跑而不考虑敌人的方位。换句话说，狐兔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关系，亦即兔子为了活命在发现敌人之后，自然会选择一条最有利的逃跑路线——和狐狸追捕方向相同，除非有其他天然障碍。不过，本文并非要讨论兰格及其最优控制理论，而仅仅是顺带提及一下它，以便借追捕问题来阐明经济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为了更加直观或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在此以狐兔博弈为例。在这个故事中的两位主角“不期而遇”了，为了生存这一最高目标（无疑是它们各自的最大利益所在），狐狸疯狂地追赶和兔子没命地逃窜，对两者而言，均在选择最佳行为。在此追捕与逃窜博弈过程中，兔子突然发现前方有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为了避免成为“守株待兔”者的盘中餐，兔子的最佳选择便是急转弯以期躲开大树，尽管一般而言跑直线对兔子来讲是“更”合理的策略。而作为追捕者的狐狸，由于可以提前及时修正其追捕路线（显然这亦是它的最优选择），故将会尽得抄近路之利，并最终取得这场博弈的胜利。

兔子最终被狐狸吃掉的结局，对某些局外人而言可能有点儿残酷。好在这个故事还有其另外一种可能的结局。在这场“追一逃”博弈中，兔子遇到的不是一棵“意外的”大树，而是一片它非常熟悉的沼泽地，兔子为了逃脱而急转弯了。此刻狐狸为了“抄近路”而调整追捕路线。毫无疑问，它们两者的行为都是最优的，但这次的结局却截然相反：狐狸因为掉进了泥潭中而丧命，兔子却大难不死。

上述两幕狐兔之间的博弈，从本质上讲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无非是两位主角的命运而已。因此，为了方便起见，在这里我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第一幕上。从这一幕狐兔博弈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不少寓意深远的东西。在这场博弈中，兔子的行为及选择自始至终都

应该说是理性的或是最大化的。换句话说，兔子始终是在扮演着一个典型的“经济人”（准确说是个“经济动物”）的角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兔子的最终结局却是灾难性的。就狐狸的行为选择而言，亦始终是严格地遵循着经济学中的最大化原则的，但其结果却和兔子的截然相反。同是最优行为，但结局却大相径庭。这便是我从此故事中领悟到的第一点启示。

直观之，导致上述兔死狐口结局的直接原因，在于那棵“树”。恰恰是由于该树的存在，才铸成了兔子的最优行为导致了最糟结果这样一个局面。考察那棵多少带点神秘色彩的“树”究竟是什么，确切地说是为它在经济学中找到适当的位置，乃笔者甚为关心的话题。对兔子来讲，此树是一个外在的、只能接收而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存在是一个不利的约束条件。把兔子引向灾难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急转弯，只有相对于“树”的存在这一约束条件而言才能成立。这也就是说，兔子的行为或选择，只能是、也应该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或最佳选择。由此可以得到的第二点启示是，“经济人”或“经济动物”的最大化行为，仅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结论可以也应该作为对经济人假定的一个重要补充或修正。通常所说的经济人必定是面对各种约束条件的人。对那种不受限制的并总能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的怀疑，也或多或少地基于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针对理性经济人而提出了所谓寻求“令人满意之结果”（注意，它不是“最优”结果）的“决策人”假定。在定义决策人的时候，人们常常爱举这样一个例子：用最尖的针缝补衣服显然是最佳选择，但在几百万根针当中，为了找到最尖的针必须对每根针加以比较才行。鉴于这样做过于麻烦，因此人们通常不去选择最尖的针，而是只选用一根可缝补衣服的针就行了，即令人满意的针。显而易见，西蒙在此是对的。但如果就此而把“决策人”说成是非

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仅有着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多少就不能让人接受了。考虑到寻找最佳选择的代价——试几百万根针，选择令人满意的方案（即可用的针），无疑是“决策人”的“最佳选择”。回想一下上述故事中的兔子，它按理说是“可以”去设法获取有关“树”的信息的，但这样做的成本或风险在那样的情况下是极高的，或是条件不允许的。我在此所说的代价、成本或风险等，都是一回事，即约束条件。由此可以说，经济人假定是普遍成立的，但他（她）必须处于特定约束条件之下。这便是我从狐兔博弈中引出的第三点启示。

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传统的经济人假定似乎没有对经济人的行为和其行为结果加以明确的区分，而是把两者视为同一，即人的（或动物的）最优行为必将导致最佳结果。鉴于此，狐兔博弈中所提示的东西就显得极有意义了：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当事者的最优行为或最佳选择，和最理想的结果在博弈过程中很可能是相互脱节或背道而驰的。换句话说，各博弈者的最大化行为只是导致最理想结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便是笔者得到的第四点启示。在这里，我假定所有人或动物均毫无例外地扮演了某种博弈的直接当事人或参加者的角色。

我们已经了解到，虽然是最优行为，但是狐狸和兔子的最终命运却会由于特定的约束条件（那棵“树”）而迥然不同。在上述故事中，狐狸无疑是特定约束条件的受益者，而兔子却是牺牲品，其损失为无穷大。一般而言，在面对各种特定的约束条件时，每一博弈参与者的损益状况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完全可能是零和的，即某些人的获益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受损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狐兔博弈便属于零和博弈一类）。特定约束条件对各个博弈活动的参与者的命运施加着不同的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从狐兔博弈中感受到的第五点启示。

在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将上面几点启示统一称之为

“狐兔原理”。当然，在此要做的首要之事是把动物（狐狸和兔子）还原为经济人。我此时所谈的经济人，是指那些博弈的参加者，他（她）们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准确地说是依据特定的规则进行博弈活动，力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现在我们来试着撩开罩在那棵“树”上的、略带神秘的面纱，以揭示其在经济学中的本来面目。据我的粗浅理解，它大致是人类行为的约束条件；它在制约人类选择的同时，也刺激着人类去进行某种选择以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它同时亦是某些经济规则的集合。在了解其基本特征后我们就不难发现，那棵“树”只能是经济制度的化身。在此，经济制度是由一系列经济规则、规则的执行或遵守以及对规则的解释（典型的例子就是意识形态）所构成。而经济规则的“硬核”——我在此借用一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当首推产权关系，准确地说是私人产权的受限制程度：财产是否具有排他性或明确地被加以界定；财产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就排他性而言，它主要涉及财产的使用权和收入（分配）权。

既然提到了产权，那么就有必要澄清一下它与人们熟知的所有权的关系。依照我的粗浅理解，所有权是指各种财产或资源最终归谁所有。一般来说，有了某种财产的所有权便同时拥有了其产权，即转让权、收入权和使用权。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英国土地的所有者是女王，但土地的产权却大都集中于私人手中。封建时期中国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乃皇帝，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尽管如此，土地这一基本资源仍可以转让于私人之间。由此可以看出，对资源配置产生直接且重要影响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权关系。可见公共所有权和相当程度的私人产权在某种意义上是能够和平共处的，从而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按照“狐兔原理”，我们很自然地会得出下面的结论：在特定的经济制度内，每一位博弈的参加者都是经济人，而且其行为或选择都是最合理的。当人们在使用财产或资源而其收入权受到限制

时，比如说收入的多寡同劳动或资源贡献的大小无关时，偷懒便自然成为他（她）们的最佳选择了。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产权直接加以限制的结果之一，便是阻止了真正的市场价格的形成，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一例。也正是在此制度下，普遍的且越发不可收拾的寻租行为便显得合情合理了，因为恰是现行制度鼓励了或在刺激着少数人去凭借权力、通过行贿受贿等途径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恰恰是由于财产权的排他性受到了损害（即产权界定模糊），才引发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病症，而后者又成为管理低效率和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温床，成为导致企业和个人创新精神萎缩衰减的基本动因。可见，正是经济制度依靠其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在幕后操纵着民族国家之兴衰的命运。今天的中国，要革除的首先应当是那些陈规陋则，以便把绝大多数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纳入国家兴旺发达之轨道。

就每位经济人而言，尽管其行为在特定经济制度下是最优的，但我不得不说，这种行为的最终结局（不仅仅可能于整个国家兴盛不利）还极可能是灾难性的。且不说那些贪赃枉法之辈的结局，工作偷懒本身这一“最优行为”带来的危害，其终极承受者，恐怕还是人们自己。在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无疑这种价格制度不合理）时，农民弃农经工经商恐怕是天经地义的选择了。可一旦出现天灾，首先面临饥荒之险的，恐怕也还是农民自己。“狐兔原理”所提示的最优行为与最佳结果相互背离的现象，被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事实所证实。就此看来，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努力扬弃旧有经济制度外，让每位当事人理解其个人选择与其终极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或各种可能结局，同样显得十分必要。

由此推出的一个派生结论是：人在面对制度约束的同时，往往还受到所拥有的信息量大小的制约。当然，从一般意义看，经济制度的制约通常也是以各种信息的形式存在的，尽管它的作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有所不同。实际上，人们对信息的态度或取舍，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于制度约束本身，至少是受到制度约束的影响的。

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制度对人类行为及其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陈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制度是人类自己构造的呀！为什么人们去构造并接受一个最终可能会于己不利甚至有害的制度呢？坦率地讲，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好问题。莎士比亚曾借其笔下人物之口说，初生婴儿是在为由傻瓜们设计的舞台（制度）而哭泣。莎翁的这一表述，至少显示了他的批判意识。而更为深层的暗示似乎还在于，此表述实质上是在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有些人（可能是那些所谓的“傻瓜”）要去设计某种表面上看是愚蠢的“舞台”？对此问题解答应该说已经蕴含于“狐兔原理”之中了，即某一特定制度对不同的参与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那些拥有更多权力或影响力去构造制度的人，同样是经济人，而绝对不是什么“傻瓜”；他们无疑是会更倾向于那些于己有益的规则。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了一句出自一位美国教授之口的话：那些有权决定是否改革、如何改革以及在改革道路上走多远的人，恰恰是那些在现行制度中受益最大的人。此教授用此句话评价的，是发生在苏联东欧各国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他的这番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改革运动体现了也必然会体现出民族和大众的部分意志，否则改革本身便是难以想象的了。

如果说从现行经济制度中获益的人大都“心满意足”的话，那么，其他受损者对该经济制度的安然接受的现实又如何解释呢？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不利于自己的经济制度又很可能是自己举手通过的。对此疑虑，我想着重谈谈所谓“搭便车”效应。简言之，搭便车是指人们普遍的一种心态，一种想方设法少付出而多捞实惠的心理或行为选择，说穿了就是想占便宜免费乘车。很明显，那些受益者是堂而皇之地搭了现行制度的便车了。而那些没能“挤”上便车的人，尽管意识到了现行制度于己不利，但作为经济人，他（她）们在精细盘算了投身于变革制度活动中的成本与收益后，通

常恐怕是选择等待和观望。同时，又寄希望于他人付出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换个角度看，如果人们都担心别人搭自己努力之“便车”，那么，亦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可能于整个国民经济或国家利益不利的经济制度便会继续生存下去，其最终结果也许会促成人为的社会动荡。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要排除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事实上，由于认清了自身利益的真正所在，许多有识之士终会形成一种变革力量。而其成功的必备条件至少有二：其一，特定的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大众的利益（因为在此制度下，人们往往深受其最优行为之苦）；其二，部分或少数有识之士们能够成功地使大众们认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他们“事与愿违”的命运（立刻想到的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此外，技术进步和新的需求的出现等等亦是引起制度演进变迁的原因。这两点怎么强调我想都不会过分。

坦率地说，企图或尝试着用一种理论去概述并解释经济历史的发展进程，虽颇具诱惑力，但同时也充满着风险。由对个人的经济行为假定去推导出整个社会的制度选择，并借以阐述制度这一起源于众多个人行为的结果反过来对个人加以约束或刺激，这种讨论方式连我自己亦觉得有些过于大胆。也许此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至多和古人幸运地“暗合”。然而，真正让我担忧的，或使我有点不寒而栗的，还是那句以哥本哈根为堡垒的物理学大师（以玻尔和海森堡为首的所谓哥本哈根学派）的名言，同时也是对人类的警告：如果我们不去描述电子的轨迹，那么，电子就没有轨迹。这几乎等于是在宣告，人类的一切解释、说明以及描述，不过是人在以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来赋予自然和历史以意义。对此，“狐兔原理”，特别是它所引出的价值判断理论，或许能帮助我们做点什么。

最后我想特别补充一点。阐明经济制度（或更为一般的制度规则）对人类选择行为所施加的影响，是此文关注的焦点。对于制度